

理论学习参考

2021年第16期

(总第102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专刊（十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2021年5月24日

目 录

【中央精神】

-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到访革命纪念地的重要启迪 10

【评论解读】

- 新华日报评论员：“梅园风范”，烛照砥砺前行路 12
新华日报评论员：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16

【党史研究】

- “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周恩来的最后一搏 18
一帧帧照片一件件文物无声讲述波谲云诡的历史
——梅园新村：见证没有硝烟的战斗 25

- 周恩来的户口卡 29
试析梅园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 31
周恩来与党的早期隐蔽战线 38

【平“语”近人】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42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44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46

编者按：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整理汇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系列专刊，供学习参考。

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人民、国家和人民军队建立的卓著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杰出楷模的崇高精神。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周恩来同志出生于1898年，在他青少年时期，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人民

命运十分悲惨。面对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周恩来同志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誓言“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立下“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远大志向。周恩来同志和他那一代杰出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深入思索，挺起脊梁，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远赴欧洲勤工俭学，通过反复比较，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他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我们党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1924年，他回国后即投身大革命洪流，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在极其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同志积极开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指导和支持各地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周恩来同志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胜利。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方针，亲赴西安，多方斡旋，推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新局面。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同志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随后率领我们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谈判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部署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并推动国统区形成第二条战线。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持起草《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筹建作出卓越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奠基性贡献。周恩来同志担任政府总理长达 26 年，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周恩来同志提出：“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周恩来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分清轻重缓急，做到统筹全局、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必须全面发展。周恩来同志提出科学是关系经济、国防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强调“我们要搞尖端国防。尖端和国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亲自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对外经济交往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调“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周恩来同志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同志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周恩来同志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领导了党和国家外事工作。他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他推动我国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周恩来同志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普遍尊敬，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恩来同志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周恩来同志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

的阴谋，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而且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周恩来同志从1927年起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巨大心血。周恩来同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中汲取智慧，善于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思考和深刻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

同志们、朋友们！

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还说过：“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周恩来同志一生都遵奉自己的誓

言。不论革命力量多么弱小，白色恐怖多么残酷，对敌斗争多么激烈，政治局势多么复杂，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挑战多么严峻，担负的责任多么艰巨，个人的处境多么困难，他都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正如他在自我解剖时说的那样：“我做工作，从来没有灰心过。”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复兴中华民族的伟业始终充满必胜信心。在他心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决定着我们的方向和立场，也决定着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周恩来同志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得失，任何时候都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把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维护和巩固党的政治大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绝对领导。为警惕和“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周恩来同志在战争年代担任红军主要领导时强调，“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的提高。红军中只能有党的领导，党要运用集中指导的原则来建立权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负责政府工作时，周恩来同志提出必须加强“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周恩来同志总是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周恩来同志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从

不搞小圈子、小集团，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条件下都首先要过好政治关。

看一名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首先要看政治上是否站得稳、靠得住，是否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始终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周恩来同志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来同志说的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他说：“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周恩来同志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热爱，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做到了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共忧乐、共奋进。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群众、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他说：“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周恩来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周恩来同志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始终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恩来同志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常说：“每个党员从加入

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时代要求，周恩来同志总是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新的挑战，参与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使自己始终同党和人民事业一道前进。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些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誓言。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我们党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周恩来同志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一生勇肩重任，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说：“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新中国成立后，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 12 个小时以上，有时在 16 个小时以上。“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辛苦，夜以继日，有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即便是得了重病之后也是如此。周恩来同志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他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抱病操劳国事，心忧百姓。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面临着新的风险、新的挑战、新的困难，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

于解决问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周恩来同志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周恩来同志毕生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周恩来同志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党组织进行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周恩来同志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有一次，周恩来同志问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回答说，党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周恩来同志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说，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1958年1月，周恩来同志到杭州视察，随身带着自己的枕巾、棉褥子、床单、被子。被子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周恩来同志就把破了的地方剪掉、两端重新缝上继续用。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开会的机会从后勤部门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周恩来同志开回来后发现换了新枕巾，就对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周恩来同志坦率地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本色。上世纪50年代，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周恩来同志带头把在淮安老家几代亲人的坟墓托人平掉，把整理出来的土地交公使用。周恩来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周恩来同志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同他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周恩来同

志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连自己的骨灰也不让保留，撒进祖国的江海大地。“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后世景仰。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接受监督，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拒腐蚀、永不沾，决不搞特权，决不以权谋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

同志们、朋友们！

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曾经写下这样的寄语：“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周恩来同志还说过：“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周恩来同志生前致力于解决的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周恩来同志生前操碎了心的广大人民群众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周恩来同志生前念兹在兹的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实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线已经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乘风破浪前行。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发进取，埋头苦干，勇于开拓，勇于创新，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人民日报》 2018年3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到访革命纪念地的重要启迪

2021年第10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文章指出，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访革命圣地，慰问老区人民，缅怀革命先烈，强调“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这些革命纪念地给我们带来什么重要启迪？一起来学习本文相关重要论述。

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要一如既往支持老区建设，关心老红军、“五老”同志和军烈属的生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请他们言传身教，确保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薪火相传。

——2014年10月31日在福建古田同老红军、军烈属和“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广西是革命老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块红色土地上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初，惨烈的湘江战役就发生在广西境内。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

——2017年4月21日在广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回想过去那段峥嵘

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

——2016年2月1日至3日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时的讲话

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

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是在旗下长大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情很深，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

——2013年7月11日、12日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

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019年9月16日至18日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

(求是网 2021年5月18日)

新华日报评论员：“梅园风范”，烛照砥砺前行路

梅园新村，隐于南京闹市。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这里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10个月零4天的谈判斗争。

2018年3月1日，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杰出楷模”对周恩来精神内涵作了深刻论述。新时代，如何学习、传承与发扬周恩来精神？回到历史的现场，倾听历史的回响，答案离我们如此之近。

一辆别尔克轿车，见证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

南京市梅园新村30号，当年曾是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如今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的一部分。“现有藏品以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成员在梅园新村居住时使用的生活用品、阅读的书籍和出版的报刊以及相关文献、书画为主。其中一级革命文物24件，包括周恩来乘坐过的别尔克轿车。”梅园新村纪念馆讲解员马悦妍说。

走进院内，转头瞥见旁边的梅园新村31号，那是当年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据点，他们利用两个窗口偷看偷听代表团的活动情况。

穿过庭院，拾级而上，沿途经过周恩来当年的办公室、会客厅、小餐厅，狭窄走道的尽头右转，就可以看到一个汽车间。一辆牌号为“京1645”的美国别尔克黑色小轿车静静陈列，它用沉默的姿态向人们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当年，代表团刚刚住下，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就在周围设立了十来个监视点，伪装成车夫、乞丐、报贩的流动特务对出入梅园的人随时进行盯梢。郭沫若曾这样描写当时的环境：“仿佛在空气里，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为满足工作需要，并突破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共代表团从上海买来了这辆别尔克小轿车。”据马悦妍介绍，险恶环境下，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多次乘坐这辆小轿车赶赴谈判地点，拜访民主人士、护送地下党员到安全地带，甚至还在车中秘密会见过重要人物，“这辆车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周恩来的移动‘会客室’。”

“把特务甩掉！”这一天，小轿车驶出梅园，经国府路（今长江路）疾驶而去，周恩来一边通过后视镜紧盯着跟踪的吉普车，一边嘱咐司机段廷英。甩掉“尾巴”后，一名中年男子敏捷钻进了小轿车，他就是中共特别党员张克侠。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徐州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在车内，张克侠汇报了徐州的战况，周恩来仔细聆听、询问、判断，最后他郑重指示，要选择有利时机，关键时刻起义，争取多拉些部队。1948年11月8日，张克侠与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一起，率领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第59军第38师、第180师，还有第77军第132师及第37师第111团共23000余名官兵，在贾汪、台儿庄地区宣布起义，加速了淮海战役胜利进程。

类似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这辆别尔克小轿车内接连上演，它成了南京谈判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重要见证。

这辆轿车如今早已驶出历史的纷繁烟尘，轰鸣不再，却经久不“衰”。1965年，梅园新村纪念馆通过与有关方面联系，从上海将这辆别尔克小轿车征集过来，将周恩来在梅园新村的谈判岁月永远珍藏。

一座矗立的丰碑，传承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梅园新村纪念馆里，一张张照片永久定格针锋相对的瞬间，一件件文物无声讲述风云变幻的历史。光色辉映中的“梅园风范”，烛照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奋勇前行。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党史学习教育江苏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李继锋说，中共代表团在南京谈判期间，坚定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国统区广泛地领导和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时间的车轮已滚动了70多年，如今的梅园，绿意盎然、岁月静好。主楼门口墙上悬挂着一张黑白相片，是周恩来当年走出梅园新村30号时拍的，故人无声，笑貌犹在。院里的垂丝海棠、圆柏、石榴树等都是代表团当年留下的，一草一木被时间滤出柔和的光晕。

梅园新村是中共党史重要的一页，是一座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的历史丰碑。如今这里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苏省党员教育实景课堂示范点”。“梅园见证了周恩来坚定、沉着、机智、从容的革

命家风度，也传承着一代人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崇高革命精神。”梅园新村纪念馆馆长沈浩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座于 1978 年 1 月面向公众开放的纪念馆 43 年后再度焕新。“深度提炼馆藏革命文物蕴含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高尚的品格情操、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畏的革命精神。”沈浩透露，梅园新村纪念馆将依托梅园精神史料展、周恩来图书馆、周恩来精神研究会三大平台，深入挖掘红色资源，串点成线，寓教于景。值得一提的是，纪念馆精心构建了由铜像缅怀、誓词重温、展厅微党课、旧址寻访、梅园讲坛五部分组成的“梅园党史红色文化党性教育实境课堂”。“可使各级党组织、党员观众通过沉浸观览方式开展党史学习，接受精神洗礼，同时为观众讲述生动而鲜活的‘梅园往事’，让观众更好地领悟周恩来精神。”

一个光荣的名字，照亮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民心惟本，厥作惟叶”。周恩来曾说，“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 12 个小时，有时甚至在 16 个小时以上。“周恩来精神的实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总理始终把自己当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强调老黄牛精神，时刻牵挂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毕生履行‘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李继锋说。

追昔抚今，周恩来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更是时代的。2019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梅园风范”是周恩来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在梅园新村的故事，被搬上了舞台、拍成了电影、写进了书籍。在现代京剧《梅园往事》中饰演周恩来的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马翔飞表示，“用传统文化形式讲述这段红色故事，格外有价值。”

渡江胜利纪念馆馆长吴小宝曾在梅园新村纪念馆工作近 30 年，他在所著的《赢得人心的较量——周恩来与国共南京谈判》新书首发式上表示，期盼读者在阅读中了解这段历史的同时，更能从书中汲取精神力量。

初心如炬，砥砺前行。周恩来精神，星火相传，燎原不熄。1986 年，梅园新村纪念馆在南京梅园中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周恩来班”，30 多年来，全国已有 191 所学校设置了“周恩来班”。梅园新村纪念馆建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 1500 万人次，并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会。

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深刻具象与真实写照，像一盏明灯，照亮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

（《新华日报》 2021 年 5 月 14 日）

新华日报评论员：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必须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要充分发挥中国革命历史的营养剂作用，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中国革命历史是进行初心使命教育最好的营养剂。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立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把这一初心使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矢志不渝、永远奋斗。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认准了这个初心使命，就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初心不改、使命不变，终于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通过党史学习，我们可以清楚认识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秘诀所在。

中国革命历史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强“四个自信”最坚实的基础。在新时代，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彻底摆脱绝对贫困的伟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信心信念。

中国革命历史是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最好的营养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深刻论断，再次阐明党的事业成功与否根本上取决于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贯穿

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条主线，也是贯穿我们党治国理政全过程最亮丽的政治底色。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中国革命历史启示我们，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奋进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宏图伟业，始终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回望过往，汲取智慧营养；眺望未来，思考使命担当。我们要用好中国革命历史这一“最好的营养剂”，为广大党员干部补精神之“钙”，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信仰之火熊熊燃烧，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风雨无阻，坚毅前行，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新华日报》 2021年5月8日）

“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

周恩来的最后一搏

1946 年 4 月 28 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 50 号周公馆举行茶话会，向重庆各界人士告别。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为了便于谈判和统战，中共代表团也将离开驻扎近 8 年的重庆，迁至南京，上海马思南路还将开辟新的“周公馆”作为办事处。

二三百人注视着周恩来踏进会场，他刚刚结束与马歇尔长达三小时的谈判，看上去并无倦容。《大公报》记者曾敏之描述了周恩来出现时的样子：“穿着派利士的西装，从他新理过发的容貌看，他显得英姿焕发。”从 1936 年西安事变起，周恩来已度过 10 年谈判生涯。“重庆是一座谈判的城市……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48 岁的周恩来不无伤感地对在座人士说道。

马歇尔见识周恩来的谈判艺术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局部内战爆发，东北成为军事角逐的重要战场。国共对开战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共军人数扩充快，但装备训练不足；国军集中在南方，运输手段有限不能长驱北上。双方都有骑虎难下之感。3 个月后，1945 年底，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都做出积极姿态，和谈重启。

中共方面谈判的重任自然落在周恩来肩上。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迪克·威尔逊评价，他在谈判时的表演跟在舞台的表演一样好。“以致当你离开他时，会带着这样一种印象：他对谈判进程每一步发展的感动人的反应都是真诚的，他是一个正直的充满信心的人……共产党人赢得大陆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以周作为另一方代表的谈判桌。”

对于马歇尔，两党心里都没底。蒋介石表示热情态度，试探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周恩来也加紧与马歇尔接触，希望他了解中共，争取他的支持。1945 年 12 月 22 日，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马歇尔，23 日登门拜访。他对马歇尔说，中共要求的民主和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周恩来娴熟地运用让马歇尔感到亲切的语言体系，努力填平双方意

意识形态的鸿沟。在随后的接触中，马歇尔发现，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尽管美国的立场必然是防止中国“赤化”，但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也是美国不能接受的。马歇尔和蒋介石谈判遇到困难时，甚至会诚意询问周恩来，如何才能说服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中共一度认为马歇尔的调处是比较公正的，马歇尔也自认为取得中共的信任。

从 1945 年 12 月 27 日开始，经过十几天反复磋商，至 1946 年 1 月 10 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周恩来和张群签订停战协定，规定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北除外。

当天上午 10 时，举国瞩目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会议代表 38 人：国民党 8 人，共产党 7 人，青年党 5 人，民主同盟 9 人，社会贤达 9 人。

1946 年 1 月 27 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30 日返回重庆赶着参加 31 日的政协闭幕会。31 日一早，他向马歇尔通报从延安带回的消息：毛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来一个口信，中共愿意在表现的这种公正的基础上与美国合作。周恩来说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今天还不打算也不可能把它付诸实现。我们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中国。

当时国统区传言毛泽东身体不好要去莫斯科休养。周恩来告诉马歇尔，毛主席听到这个谣言觉得很可笑，说自己身体如果不好，宁愿去美国休养，因为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可学。马歇尔表示，如果毛主席要去华盛顿的话，他可以安排飞机，甚至可以赠送一架专机。

1946 年 2 月 28 日，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开始视察华北华中各地停战和整军情况。3 月 4 日，三人小组飞抵延安。中共中央抽调 500 名相貌端正的战士紧急训练成仪仗队，在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陪同马歇尔、张治中检阅了这支队伍。当晚，毛泽东在延安大礼堂招待他们看文艺演出，马歇尔坐在毛泽东和江青中间。陕北天气很冷，他靠在躺椅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脚底下放着火盆。

和谐的画面定格在这个夜晚。3 月 11 日马歇尔返美述职，毛泽东、

周恩来希望他解决东北问题再走，马歇尔执意不肯。马歇尔刚走，国民党进占沈阳，东北战事迅速升温。马歇尔的代表吉伦要求中共让步，周恩来与国、美代表激烈争吵，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必须在东北大打”，“非打不足以杀其锋”。

4月下旬，马歇尔述职归来，中共已经在东北取得优势。周恩来与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马歇尔来华以来，往往是他长篇大论，周恩来认真倾听，而这一次，周恩来强势反攻，指责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周恩来的翻译章文晋回忆，全程三四个小时，几乎全由周恩来一个人发言，马歇尔无言以对。他对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

如退出苏北，我对不起淮安父老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至南京。董必武带队在重庆白石仪军用机场搭乘美军飞机，结果飞机有些故障，起飞两次都是在空中转了几圈就降落。董必武怀疑飞机被人动了手脚。就在不久前的4月8日，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人从重庆返回延安，遭遇空难无一生还。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扣押，他的出狱是周恩来在漫长谈判中争取到的成果，孰料一代将星就这样陨落。董必武对随行人员说，我们现在不能说“四八”空难是有人搞鬼，但这是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不防国民党特务搞破坏。大家商量决定，向国民党提出，飞机不能只载共产党员，必须国共双方人员共同乘坐。几天后，董必武带着30余人分两次乘机，每架飞机都有到南京复员的国民党官员同行。

周恩来要求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分别划拨房屋，供中共办公。当局批了南京梅园新村三幢小楼，拒绝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先期到达上海的乔冠华、龚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租下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别墅，对外称周恩来将军公馆，其实是中共驻上海办事处。

周恩来5月3日飞抵南京入住梅园新村，当晚给中共中央致电：“最近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接到许多封关于苏北清算斗争的信件，众口一词，提到过火。”建议“可否在苏北之斗争方式择较温和的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者阶级”。

抗战胜利后苏北成为解放区，土改工作全面推开，中共改变抗战期间团结各阶级抗日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地主乡绅。1946年上半年，数千名地主拖儿带女从苏北逃到上海南京，形成难民潮。难民组成请愿

团致电蒋介石，要求政府保护还乡，街头常有难民游行，甚至一度传言难民团要冲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苏北难民问题忧虑，呼吁共产党应履行抗战期间许下的不进行激烈土改的诺言。

1946年6月，国民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东北停战刚刚达成协议，苏北又成为焦点。谈判桌上，国民党代表一再坚持中共退出苏北，难民问题是撒手锏之一。周恩来说，也有大量难民从政府地区进入共产党地区，但是共产党的办法是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而不是为了宣传目的和制造混乱而利用他们。中间党派也劝说中共让步，周恩来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同意蒋介石的要求，我对不起淮安父老。

1946年6月23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上层人物赴南京请愿，并组织群众在欢送代表团后举行游行示威。周恩来亲自动员马叙伦，马叙伦又发动了胡厥文、雷洁琼等人。代表团在南京下关车站一下车，有几名自称苏北难民的人挤上来，不满代表团为中共做说客，交谈几句突然翻脸，“难民”蜂拥而至大打出手，其中混杂特务，马叙伦、雷洁琼等被打伤住院。这个事件被称为“下关惨案”，国共借此事件互相攻讦，舆论哗然。

1946年7月，连续发生的“李闻惨案”让国民党声誉扫地，《新华日报》发表抗议书和唁电，在国统区产生巨大反响。闻一多被暗杀之后11天，在朋友家躲避迫害的陶行知突发脑溢血逝世。周恩来当时正在从周公馆出门准备乘飞机去南京，中共上海工委财经委书记许涤新回忆，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热泪几乎滴满了他的办公桌。7月17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中国此时最严重最迫切的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

7月19日，中共中央才回复周恩来关于苏北土改的意见：“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为国家民主化、工业化打下巩固基础……过火行为是个别现象，是难免的。请向民盟说明中共的土地政策。”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苏北可能是国民党军进攻方向，要积极做好准备。后来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杨兆麟当时是新华社的年轻编辑，每天负责往周恩来办公室送电讯稿，有一天傍晚周恩来接过电讯稿，看到头条消息是解放军在苏北打了大胜仗，说：“像这样的消息以后要早一点告诉我。我下午去和他们谈判，要是知道这条消息，就好说

话了。”中共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又得到了东北部队从苏联方面取得的大批武器弹药，战斗力大增，1946年七八月间在苏北七战七捷。

南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至1946年7月，内战既成事实，国共双方都清楚谈判没有多少意义了，但是双方都在坚持谈，都在想办法让对方先“掀桌儿”，承担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责任。用马歇尔的话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周恩来在1946年底撤回延安后说，说马歇尔“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

1946年9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张家口是国民党在历次谈判中明确表示同意中共军队占有的地区。周恩来反应激烈，愤而退出谈判，于9月16日乘飞机去了上海，在周公馆住了36天，在中间党派反复劝说下，为了表示中共仍有和平诚意，才返回南京。

在上海期间，周恩来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内战的责任应该由国民党负，他向社会各界强调，攻张家口就是蒋宣布决心放弃谈判，走向全面破裂，一切严重的后果和责任都应由国民政府负之。他和邓颖超出席上海各界5000余人举行的追悼李闻大会，在悼词中写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有了军事底牌，蒋介石公开宣布国民大会将定期召开。诚如梁漱溟当时的名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周恩来开始有序布置南京上海两地中共人员疏散，有的转入国统区地下，有的到香港做海外工作，有的回解放区。他在周公馆邀请郭沫若、许广平、马叙伦、马寅初等见面，说道：“1931年冬天我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何时再回来，觉得渺茫，现在可就不同了，无论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快则一二年，迟则三五载。”

眼见国共破裂，第三方人士很着急，梁漱溟提出一个方案，其中包括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就地一律停战等等，复印三份，分送马歇尔、孙科和周恩来。梁漱溟、李璜、莫德惠等民主人士到梅园新村向周恩来

解释这个方案，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周恩来脸色变了，他用手制止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国民党军队刚抢占了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战等于对国民党有利。周恩来激动地说：“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

“关照”指的是几天前中共与民盟达成协议，凡有重大行动之前要互相通知。见周恩来大怒，梁漱溟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找来梅园新村商量，大家决定将送出的方案收回。到马歇尔处，发现他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拆开，赶紧原样拿回来了。到孙科处，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也拿回来了。此事不了了之。

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目前的工作在揭穿美蒋的欺骗，打破第三方面的幻想，故稍留几天再回延安。”蒋介石坚持要召开国民大会，立法统，中共表示如不停战，不退回到政协停战协议时的状态，决不参加一党包办的国大。周恩来后来解释道，“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中共和民盟缺席，这次大会被中共称为“伪国大”，中共认为这标志着国民党关闭了和谈大门。周恩来总结：“这是八年抗战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人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1946年11月16日下午2时，周恩来在南京举行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新闻界知道，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在国统区见到周恩来，很多记者吃过午饭就赶来占座，有的报馆派了近10名记者，还有总编辑亲自出动。仿佛为故意引起人们对和平时代的回忆，周恩来穿着政协会议时穿过的黑呢中山装入场。半年多之前，他刚在重庆举行了伤感友好的告别会，这次在南京的告别会则有几分火药味。会场墙上挂着大幅“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形势图”，工作人员给记者散发中共的书面声明，谴责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大违反政协决议和全国民意，中共坚决反对和不承认这个国大。

在座记者立场不同，抛出不少尖锐问题。有记者责问周恩来，报纸上常常登载中共屠杀农民的事，苏北逃来的农民都骂中共，这是为什么。周恩来说，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

是那些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至于说中共屠杀农民，如是事实，就无劳蒋主席派兵去打，中共早就自取灭亡了。有记者提出外界传闻中共与苏联有密约关系。周恩来说，中共和苏联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和苏联人士的交往是在如鸡尾酒会之类的外交场合。两个小时的记者会，周恩来没有被任何问题难住。

许多记者问周恩来几时回来，他说“南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1月19日，周恩来和邓颖超、李维汉等人撤回延安。终于暂时结束了十年谈判生涯，周恩来脱下西装，披上毛泽东迎接他时送给他的大衣。

南京中共代表团改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留下少部分工作人员，由董必武任主任。1947年2月28日，南京卫戍司令部通知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限令5日内撤走，梅园新村整条街道被警车和武装特务封锁，不许与外界联络。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委托无党派的《南京人报》记者设法伪装混入梅园，交给他一份中共代表团的告别声明，并塞下30万元广告费，一则感谢，二则以登广告之名发布可避免报社承担罪责。3月7日清晨，随着报童的呼喊，南京大街小巷传遍“中共代表团董必武及京沪两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全体人员启事”，声明中共人员被强令限期撤返。

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团70多人乘5架美国飞机回延安，每个人的名字都在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名单上，既不能多走一个人，也不能漏下一个人。有两名中央大学的学生此前冲破封锁闯入梅园新村，要求去延安。共产党不可能在宪兵“护送”之下多带两个人登机，只好让他们藏在《南京人报》记者的汽车里送回学校去了。登机人员做好了“被制造”事故的思想准备，当飞机平安地到达延安时，他们都高兴极了。

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做报告，总结一年来的谈判情况。他说道：“七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欺骗。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之后才能走，一定要在第三个阶段结束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

（《国家人文历史》 2015年第19期）

一帧帧照片一件件文物无声讲述波谲云诡的历史

——梅园新村：见证没有硝烟的战斗

一场春雨之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上车流如梭，梧桐浓荫遮蔽。梅园新村民国建筑群中，周恩来铜像身姿矫健、气宇轩昂。75年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就是在梅园新村的3栋民居中，为民主据理力争、为和平奔走疾呼。

从1946年5月3日到1947年3月7日，国共南京谈判在国民党政府的一意孤行下最终走向破裂。但中共代表团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卓越的胆略智慧，与坚持独裁、内战立场的国民党当局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向全世界揭露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最大限度地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里，一帧帧照片永久定格针锋相对的瞬间，一件件文物无声讲述波谲云诡的历史。胸怀坦荡、坚忍不拔、无私忘我的“梅园风范”，烛照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奋勇前行。

“群狼环伺”愈显“梅园风范”

推开梅园新村30号的铁门，高高的围墙后，两株柏树虬劲挺拔，垂丝海棠花开正艳。与75年前相比，小小的院落几乎没有变化。

1946年5月3日，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从重庆移师南京，继续国共和平谈判。包括董必武、陆定一、廖承志、李维汉等在内的代表团成员，就工作生活在梅园新村17、30、35号3栋小楼里。当时，这个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居民区，其实危险无处不在。

电影《一号目标》真实还原了当年的场景：与梅园新村30号一路之隔的31号，两个窗口后面总有一双眼睛虎视眈眈；街头巷尾到处是乔装成裁缝、鞋匠、黄包车夫、算命先生的特务，每个到访的客人都会被跟踪盯梢；代表团的汽车一出门，国民党的“尾巴”立即如影随形……曾经到访过梅园新村的郭沫若，在《南京印象》中留下这样的文字：“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谈判桌上，国民党毫无诚意，内战阴谋昭然若揭。走出会场，反动特务“群狼环伺”。表面中立的美国，持续向代表团施加压力。

1946年6月，短短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先是上海“和平请愿团”在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包围毒打，而后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接连被暗杀。暴力和死亡，吓不退共产党人。面对中外记者，周恩来愤然陈词：“我们随时准备好了接受李公朴、闻一多同样的命运，要怕就来谈不敢来谈判，来了就不怕！暗杀绝不能阻止我们为中国之和平、民主而奋斗！”

梅园新村30号的车库里，一辆车牌为“京1645”的别克轿车，是代表团的“移动会客厅”。周恩来不仅在这辆车上会见了张克侠等一批地下党员，还曾用它转移过多位民主进步人士。司机段廷玉把与特务的“游击战”戏称为“遛狗”。在新街口、大行宫、国府路（今为长江路）一带，这辆车穿梭于车水马龙，常常利用红绿灯切换甩掉尾随的车辆。

“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代表团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重，与反动势力斗智斗勇，争取了朋友，赢得了民心！”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馆长沈浩说，尽管谈判以失败告终，但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展现出的崇高理想信念和独特精神品质，却在这里沉淀为“梅园风范”。

一段红绸见证“新华基因”

梅园新村的300多个日夜，在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先后有200多人。他们每天面临的，是生与死的考验、正与邪的较量。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展现出与生俱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0个月内，有6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

1946年5月底，安静的院落里突然热闹起来，门头张灯结彩，一场简朴又热闹的婚礼正在举行，主角就是同在《新华日报》工作的鲁明和林冈。1941年皖南事变后，身为董必武政治秘书的鲁明因革命需要，担任《新华日报》首席记者。国共谈判期间，年近30岁的他随代表团辗转南京，任《新华日报》、《香港商报》、新华社驻南京特派员。这位“大龄青年”的婚事，邓颖超一直记挂在心里。在她的撮合下，组织上将出身名门的爱国青年林冈调到《新华日报》南京办事处，从事编辑工作。

共同的信仰，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当时，代表团生活清苦，没有什么像样的礼物送给这对新人。婚礼现场，细心的邓颖超扯来一段红

绸，请德高望重的董必武赠言，董老提笔蘸墨，“天作之合”4个大字一气呵成。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王炳南等代表团领导及工作人员纷纷在红绸上留下名字，以表祝贺。邓颖超更是现场传授她与周恩来的“幸福密码”——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谅、互让。

“说来也怪，文革中我们家被抄得连一本书、一件玩具都没有了，唯独这件宝贝完好无损。”中国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鲁明与林冈之女林力回忆说，这块红绸，父母一直视若珍宝，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建设期间，他们主动将文物捐出。

红绸上28个密密麻麻的签名，是代表团肝胆相照、勠力同心的最好写照，更见证了《新华日报》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从1938年创刊时“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个人的喉舌”，到被毛泽东称赞为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另一方面军”，再到如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80多年来，《新华日报》的党性原则和为民情怀一脉相传。

创新传承汲取奋进力量

路边的街心公园，遛鸟的居民在鸟鸣声里聊着家常；围墙后的院落里，不时传来儿童追逐嬉戏的欢笑；巷口的屋檐下，一对老夫妻悠闲地晒着太阳……时光转眼走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如今的梅园新村岁月静好。

在崭新的时代聆听历史回响，总能找到情感的共鸣。“希望每个观众，都能在这里接受一次精神洗礼，汲取一股奋进的力量。”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副馆长孙烈涛介绍，为配合党史学习教育，纪念馆正进行内部出新升级，5月重新开馆后，将用更为丰富的史料文物和更为新颖的展陈方式，让更多人从那段峥嵘岁月中汲取力量。

“梅园风范”是“周恩来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在梅园新村的故事，被搬上了舞台、拍成了电影、写进了书籍。2019年首演的现代京剧《梅园往事》，用两个小时浓缩了10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剧中饰演周恩来的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马翔飞认为：“很多人都只是听说过梅园新村里发生过的历史，但没有深入了解，用传统文化形式去讲述这段红色故事，格外有价值。”

红色资源，因创新表达而生动立体，因活化利用而历久弥新。2020年7月17日起，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首次在夜间向公众敞开大门，每周五、六延时开放至晚上10点，同时设计了“小小报务员”等实景教育活动，既提升了游览体验，又赋能了地方发展。2020年，玄武区提出建设长江路文旅集聚区，并组建文旅产业发展联盟，梅园新村纪念馆率先支持，与周边的六朝博物馆、江宁织造博物馆等文博场馆，共同构建起长江路上的“文旅矩阵”。

新的时代背景下，“梅园风范”正在成为凝聚人民群众、激励党员干部的精神指引。沿着巷子往北走100米，就是“小红梅”信仰空间。走进这个由梅园新村社区打造的特色党建阵地，随处可见那段历史的印记。

3月22日，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李忠杰来到这里，与基层党员群众开展面对面、互动式宣讲。“身处革命前辈们曾经的战场，我们更应把学习党史的热情转化成为群众办实事的实干担当。”社区党委书记郝晴晴有感而发，基层工作者是距离群众最近的人，唯有聚焦百姓急难愁盼，做好一件件暖心小事，才能兑现在党旗面前许下的铮铮誓言。

（《新华日报》 2021年4月19日）

周恩来的户口卡

林建英（梅园新村纪念馆综合业务部副主任）：

我们纪念馆珍藏着 88 张个人户口卡，22 张集体户口卡，全部都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些户口卡是在建国之后，在当时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的仓库里面找到的。个人户口卡还有集体户口卡，户主都是周恩来。这些户口卡上面登记的信息非常详细，有每个人的照片、姓名、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住所等，还有一个户籍编号，还包括家属亲属信息等。中共代表团在这边不是长期性的居住，为什么也给做了户口卡？它是出于监视的目的。

1946 年 4 月 30 日，国民政府下达了还都令，它的首都从重庆又迁回了南京。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继续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向国民政府提出前往南京继续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的要求。经过中共代表团的努力和工作，终于把驻地定到了梅园新村，国民政府把梅园新村的 30 号和 17 号交给我们中共代表团来使用，作为代表团的驻地。南京谈判是重庆谈判的延续。

中共代表团当时在南京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将近 200 人，但是有户口卡的是 88 人，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人都暴露出来，这也是一个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策略。中共代表团除了谈判，还要进行一些党的政策宣传，结交一些朋友，开辟第二条战线。他们结交了很多社会名人，像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有一些社会名人也会到代表团的驻地来，所以国民政府对代表团驻地的监视是非常严密的。梅园新村 30 号周围布满了监视点，除了有固定的监视岗哨之外，还有大量的流动特务。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窗口是梅园新村 31 号的，它当时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驻点监视的窗口。这个窗口可以居高临下，看到 30 号院子里里面的一举一动。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他的办公室和卧室是在一起的。邓颖超后来回忆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当时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工作也是非常艰苦的。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工作。代表团刚到南京的时候，正好是南京的仲夏时分，南京的天气非常闷热。我们代表团的机要人员是有保密要求的，周恩来把

他们安排到了自己住处的二楼，窗户要关得密不透风。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是非常关心这些机要人员，那时候电风扇非常少，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不舍得用，把电风扇拿到二楼，给机要工作人员使用。周恩来还经常对这些机要人员进行一些革命气节教育。机要人员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是不允许外出的。如果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1947年2月，国民政府连续发布了几道命令，要求我们中共代表团限期撤离南京，还有重庆、上海一部分都要撤回，完全撕破脸了。董必武率领我们代表团政府的工作人员，在3月7日从南京撤回延安。董必武当时在机场对送行的人讲：“再见之期当不在远”。两年两个月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这句话就实现了。

南京谈判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它的意义非常大。毛泽东谈到南京谈判的时候，说谈判最大的功劳就是教育了人民，使我们党赢得了民心，让老百姓看清楚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是为人民着想的。

（求是视频 2020年3月1日）

试析梅园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南京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从雨花台烈士陵园到渡江胜利纪念馆，再到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浓缩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光辉历程，见证了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所付出的英勇牺牲与不懈努力，成为南京这个城市弥足珍贵的红色精神财富。笔者在本文中将从记录国共南京谈判历史的梅园红色文化中，探究南京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

一、梅园红色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

梅园红色文化的产生，是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的特殊环境中，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团结、民主，在争取和平统一的伟大实践和历史进程中孕育出的文化成果。

（一）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与国共内战一触即发

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洗雪中华百年屈辱而进行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民族战争。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倡导实现和始终坚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的绝地迈向独立解放的坦途，取得了民族抗战的彻底胜利。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走向成熟，不断发展壮大，领导中国人民最终建立了新中国，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虽然，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已经形成，但是，在怎样进行抗战的问题上两党却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指导路线。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而此时的国民党却依靠美国的援助，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内战一触即发。

（二）党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一行前往南京，入驻梅园新村，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梅园红色文化就此孕育而生。

在国共南京谈判的10个月零4天里，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成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胆略智慧，顶住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与坚持独裁、内战立场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美蒋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阴谋暴露无遗。同时，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的真实意图，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看清了美国政府援蒋内战对华政策的实质，争取了中间势力的支持，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为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准备以自卫战争粉碎美蒋反动派的进攻赢得了时间，也为后来打败国民党奠定了政治和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员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坚持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展示了一代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和工作作风。梅园红色文化正是在一个优秀的群体中蓬勃诞生，它是我党的精神财富，沛然充盈于中华民族的肌体，激励我们将它进一步研究和发扬光大。

二、梅园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

在梅园新村这个团结战斗的集体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身居虎穴，与国民党进行铿锵有力的谈判斗争。他们保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有理有节，以巨大的人格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简朴的生活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国家的真和平、真民主而不懈努力。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梅园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共代表团为了国家前途、民族利益，不畏艰险、坚忍不拔、无私忘我的崇高革命精神。

（一）崇高的思想境界

崇高的思想境界，是在国共南京谈判的特殊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谈判条件而达成的生命整体状态。梅园红色文化中所展现的崇高思想境界，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武装。

少年时代的周恩来，在生母、乳母和养母的悉心照料下，深受古代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影响。到南开中学后，针对当时日益衰微的国民之风，他在《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一文中发出“纵察往事，而返观吾千钧一发之神州，四千年之文明已失其旧，思想日趋卑鄙，民气日渐消磨”的感叹。由此可见，深受中华儒家思想影响的周恩来，在树立人生志向时追求崇高思想境界的抱负，这说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在探索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始终把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作为同步推进的目标。

此外，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梅园红色文化的重要内涵。中共代表团成员心系国家，胸怀世界，恪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虽不能致，心向往之”，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在国共南京谈判的艰难时期，在四处理伏的梅园新村驻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和平统一与国民党政府继续和平谈判。这是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诠释，这一切也充分融入了梅园红色文化中。

（二）坚定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对真理的追求。梅园红色文化中的理想信念，是中共代表团成员对革命理想的无比忠贞，对共产主义事业终将胜利的坚定信念。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入驻梅园新村。在代表团驻地周围，被安插了数个国民党特务监视站以及佯装成各种行业的流动特务。郭沫若曾在《南京印象》一书中这样写道：“仿佛在周围的空气里，四处都闪烁着狼犬一样的眼睛、眼睛、眼睛……”在此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中共代表团成员始终坚定争取和平、民主的信念，通过坚持不懈的谈判以及各种渠道对外及时发布谈判进展，尽可能地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新中国而做到了仁至义尽，终于赢得了人心。

正是因为在梅园新村的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他们在谈判取得进展时不骄不傲，遇到阻挠时不懈不弃，他们所传达的理想信念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遗产。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加强革命传统

教育和气节教育，以未来的前景相互激励，使坚定的理想信念成为梅园红色文化的重要内涵。

（三）巨大的人格力量

巨大的人格力量，是在国共南京谈判的特定环境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外化，它是梅园红色文化的精神体现。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党员所体现出的巨大人格力量，来自于不断的修身磨砺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引导。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追求人格完善的自觉意识。儒学创始人孔子推崇的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些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逐渐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成为塑造和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动力。

追求人格的完善，青年周恩来也如是。在南开中学的新式教学中，周恩来通过修身继承了民族优秀传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格观。面对社会独立后，生活的艰辛和磨砺，使他在接受社会教化中逐渐养成了健康的人格。因而，周恩来在中学毕业时得到了“君性温和诚实，最富有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的评价。

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在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前，委托秘书王炳南将一只五彩人物敞口瓶赠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虽然谈判中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与美方代表针锋相对，但司徒雷登对周恩来的人品一向赞赏。收到礼物后，他非常感动，携带回美国，一直悉心珍藏。美国特使马歇尔对周恩来的品格非常敬佩，称“周恩来将军不愧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外交家”。为了表示对周恩来的敬意，他特地送给周恩来一只手提式公文包，皮包表面有烫金英文：“马歇尔将军赠周恩来将军”。

（四）朴素的生活态度

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成员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是梅园红色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在南京梅园新村，代表团所处的政治环境比重庆时更加严峻和险恶，生活也更加艰苦。

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体成员都能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吃的依然是每天每人二两肉、二钱油、一斤蔬菜的家常便饭；住的方面，通常几个人住一间屋，即使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只能在一个套间，既是宿舍又是

办公室。他们认为，在自己身上节约，就可以给党、给人民军队多增加些经费，解放区军民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周恩来、董必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美方谈判，另一方面又要与第三方会见协商，还要不断接见中外记者，经常晚上开会、审稿，甚至亲自起草电报，睡眠时间很少，有时一边吃饭，一边与工作人员研究工作，甚至饭没有吃完，就被喊走了。

1940年，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期间，由于工作需要，给他做了套藏青色西服。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常穿着这套西服，外出谈判或接见客人。他深知党的经费来之不易，所以特别爱惜，每当办公时总要戴上护袖，唯恐磨损。1945年4月至6月，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参加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党中央给他买了一个公文包装文件。会上，他向世界人民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成就。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外出谈判时董必武依然带着这个公文包，装一些机要文件，后来皮包带磨坏了，他就把自己的皮鞋带解下来绑在皮包上继续使用，解放后依旧在使用。这些艰苦朴素的生活细节，已深深印入梅园的历史，凝结在梅园红色文化中。

三、弘扬梅园红色文化的实践价值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新时期加强党的先进性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本要求，以及“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要求，对弘扬梅园红色文化的实践价值做如下诠释。

（一）弘扬梅园红色文化，有利于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红色文化是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不同历史阶段所培育形成的红色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和风采，更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特点。正是如此，弘扬梅园红色文化就要持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尤其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梅园新村纪念馆自建馆以来，馆内研究人员和社会各界专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深入研究和挖掘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价值，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譬如：自1985年以来，梅园新村纪念馆在

全国多个城市包括西藏、宁夏等边远地区创办近百个“周恩来班”，以伟人精神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每年暑期举办“红色文化主题夏令营”，讲述梅园故事、传播梅园精神，在全省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各级领导对梅园红色文化的关心指导下，作为研究人员，需要重新审视发掘红色文化，更好地发挥其对爱国主义精神和价值的推进作用。

（二）弘扬梅园红色文化，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中共中央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梅园红色文化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不懈追求，爱国主义情怀贯穿国共南京谈判的整个过程。正是由于梅园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特性，弘扬梅园红色文化，必然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弘扬梅园红色文化，有利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开展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中央决定，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指的是“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

梅园红色文化形成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代表团成员严格执行并遵守中共七大上确定的党章。七大党章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七大党章还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正是基于七大正确的路线方针。如今，我们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正是在梅园红色文化一脉相承的基础上重温并深入学习党的发展历史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因

而，弘扬梅园红色文化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有着深远的意义。

历史总是在百折千回中迤逦前进，作为在红色化场馆工作的工作者，我们应协力同心、勇挑重担，在建设新南京的征程中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业绩，把先辈们留下的红色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让红色文化始终与美丽南京交相辉映。

（作者：杨晓慧，系南京市博物总馆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综合业务部主任、文博馆员 《中国纪念馆研究》 2017年第1期）

周恩来与党的早期隐蔽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艰苦漫长的斗争历程中，相对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还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大作用的隐蔽战线。鲜为人知的是，周恩来就是这条战线的主要创始人和杰出统帅。党的隐蔽战线包括情报、机构、通讯等方面工作，是一门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不仅要从宏观把握战略层面，还要周密考察每一个战术环节，甚至具体到每个细节。在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中央特科”等重要历史事件中，周恩来精心策划、呕心沥血，充分发挥隐蔽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场景的独特作用，从而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

隐蔽工作的成功尝试——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7月24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认真分析了革命形势，决定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坚决反击，在南昌进行革命武装起义，组建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这是一项关乎共产党命运前途的重大决策，不允许泄露丝毫消息，周恩来特别注重从源头上严格控制情报的知晓范围。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前往九江。临走之际，他对妻子邓颖超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在陈赓等人护送下，经九江秘密抵达南昌，当晚下榻在花园角2号的一处寓所，与先到南昌做起义准备工作的朱德会合。朱德按照上级指示，悉心绘制南昌市区地图，详细了解敌军兵力部署的情况。还与驻守在南昌的国民党第三、第九两个军的几个团长频繁接触，随时掌握敌情，成功掩护一些起义领导人抵达南昌。当朱德把所需的地理材料和军事资料放在桌上时，周恩来称赞朱德的心血没有白费，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尤其南昌起义打响时，朱德还以设宴的名义，拖住了敌军两个团长及一个团副，更加有力地配合了南昌起义的战斗。

周恩来深知，军队中党的组织是极其秘密的，为保证战斗隐蔽性之目的，他进行了严密细致的部署，即便在起义的前两天，会场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戒。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百花洲畔一栋教学楼内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部，叶挺召集营长级以上军官开会，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任何闲人一律不许进去。同时，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和教堂内的第二十军指挥部，贺龙也召开团长级以上军官会议。而获悉南昌起义计划的团、营级军官，同样也严守机密。时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营营长袁也烈后来回忆：“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三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命令是隐蔽而逐级向下传达的，连级干部直到队伍出发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当他们得知准备南昌起义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后，大家仅剩下一件心事，就是盘算着何时把任务传达给排长、班长和战士。7月31日下午，时任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警卫队班长的粟裕，才接到“擦拭武器、补充弹药、整装待发”的命令。天黑之后，战士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私下嘀咕：要打仗了吧！跟谁打呢？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呢？恰巧周恩来路过战士身旁，他停留了一会儿对大家说：“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齐答：“不怕！”周恩来接着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至于非作战人员，则是在战斗打响之后才得知起义了，当时在军事参谋团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忆：“当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直到天明，我们终于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

8月1日凌晨两点，南昌起义各部队按预先侦察好的方向目标，对没有准备的敌军采取突袭，敌人惊慌失措，迅速瓦解，这些行动与周恩来领导下的出色情报保密工作息息相关，从策略上保证了南昌起义的发动和成功。

创建专门的工作机构——中央特科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这里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又是反革命势力的大本营。同时，“革命形势一经变动，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自首告密叛变的事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面对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和血腥屠杀的残酷局面，要把国民党统治下广大地区的党组织保存下来极其困难，要使它得到巩固和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创建专门的工作机构，他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以原武汉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的李强等同志为骨干，又吸收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同志，由周恩来亲自指挥。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惩办叛徒，营救同志，打击敌人，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周恩来对中央特科的建立、发展、完善及一系列活动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原则，并注重实践历练。在敌人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工作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为中央特科举办训练班，周恩来亲自为训练班作政治报告讲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原则，同时学习秘密工作的技术和秘密工作纪律，如化装术、侦察与反侦察、上海市区道路和居民住宅情况、密码破译、密写技术以及被敌人抓捕后开镣技术等，并乘船去海上进行射击训练。

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央特科根据工作需要逐步建立了各有分工又密切合作的四个科：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总务事项；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情报工作；第三科为行动科，承担惩办特务、镇压叛徒的任务；第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负责无线电的通讯联络工作。党的六大以后，为加强对中央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

在实际对敌工作中，周恩来亲自指导中央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机构中建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如深得陈立夫、张道藩信任的“大红人”，后被陈立夫正式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的杨登瀛。他从参加国民党侦察机关就一直为中央特科工作，多次提供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采取的行动计划，弄清了隐藏在我党内部的叛徒与奸细，积极营救被捕的同志，还从敌人手中巧妙地夺回党的机密文件，为党中央的安全和中央特科准确打击敌人、严惩叛徒作出了重要贡献。再如国民党上

海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宋再生，也是中央特科安置在敌人内部的反间谍人员，他曾协助陈赓处决了两个企图向敌人告密的奸细和叛徒。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多次在敌人对中央机关采取毁灭性行动的危急关头，及时传递准确情报，为党的转移和采取应变措施赢得了时间，保证了中央机关的安全。但意想不到的变故还是发生了，严重考验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立即叛变投敌。他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对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住处了如指掌。接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周恩来临危不惧，他当机立断、有条不紊地作安排。当天就同陈云商定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机要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他们的秘书中凡可能为顾顺章所认识的都做调动；将一切顾顺章所熟悉的、可能成为其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实行紧急改变。在周恩来严密部署下，当天夜里，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转移。周恩来率领中央特科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赶在敌人前面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使敌人处处扑空，企图一网打尽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1931年12月上旬，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从1927年到1931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与敌人进行了艰苦而隐蔽的斗争，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斗争史上建立的卓越功绩不可磨灭。

（作者：张树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委员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8年3月2日）

平“语”近人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和经典名句为切入点，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阐释与广泛传播。我们选取了《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以来的“总书记原声”和“经典释义”等内容，供学习参考。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一、总书记原声

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所尊崇。

二、经典释义

这段话是2016年4月2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和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的时候讲到的。短短的一段话里，总书记有三处用典，而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是经典名篇《岳阳楼记》的点睛之笔，更是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多次提及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出自《岳阳楼记》。《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是北宋名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家、文学家之一。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六年，范仲淹当时58岁，正担任邓州的知州，也就是在今天河南的邓州。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范仲淹本人并不在岳阳，他是收到了滕子京寄来的信，邀请他为重修的岳阳楼写一篇记，范仲淹慨然应允，然后就有了这篇名垂千古的美文《岳阳楼记》。

范仲淹在北宋仁宗朝曾经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是副宰相。就在写

这篇《岳阳楼记》的三年前，也就是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九月，宋仁宗开天章阁，诏富弼、范仲淹等人条对时政。范仲淹应诏上“十事疏”，提出了翔实的新政的措施，也标志着庆历新政正式启动。那个时候，虽然北宋表面上非常地繁华，但实际上隐忧重重，正是基于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范仲淹才提出了翔实的新政策略。但是，历来改革必然会遭遇到层层阻力，迫于来自反对派的强大的压力，本身改革意志就不坚定的宋仁宗动摇了。在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自请罢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邠州，同时兼任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年十一月，范仲淹的四路安抚使帅任被解除，改知邓州。这就是这篇《岳阳楼记》创作时候，范仲淹的个人经历背景了。在这里我不得不重点提一下，可能会被很多人忽略掉的一个人。谁呢？滕子京。因为没有他的邀约，就不可能有这篇著名作品的传世。滕子京就是滕宗谅，子京是他的字。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多年的好朋友，两个人不仅留下了很多诗歌唱和的作品，而且在政治上也经常是同荣辱、共进退。

滕子京也是一个胸怀家国的人，虽然屡屡被贬，但是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能够放下自己的荣辱名利，始终勤政爱民。他来到巴陵郡之后，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是两手抓。不到两年的工夫，巴陵郡就显示出百废俱兴、政通人和的气象。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范仲淹《岳阳楼记》里面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明像范仲淹那样的古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会因为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动摇、而改变。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个人的安逸喜乐反倒被他们抛在了脑后。这也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依然可以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一、总书记原声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两院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角，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

二、经典释义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5 月 28 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在这次讲话当中，总书记引用了两句诗：“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两句诗出自于明代爱国名将戚继光的著名诗篇《望阙台》。戚继光，相信大家都如雷贯耳。他出身将门，父亲戚景通就是一位将军。戚景通在 56 岁的时候，才得了这么一个儿子，算是老来得子。但是，戚景通并没有一味地、毫无原则地溺爱儿子，而是从小就严厉地教导他，他给儿子取名“继光”，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够继承将门家风。

嘉靖三十四年，28 岁的戚继光奉命调防浙江，这正是当时倭寇活动尤其猖獗的地方。来到浙江之后，戚继光深刻地意识到，组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于是他排除万难，组建了一支“戚家军”。正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在戚继光的指挥下，戚家军横扫倭寇，让沿海人民重新过上了安宁的生活，建立了彪炳千秋的不世功勋。嘉靖四十二年，戚继光又奉命调援福建，继续开始荡平沿海的倭寇。

这首《望阙台》，正是戚继光写于镇守福建的时候，望阙台本来是一处高台的名字。“阙”，本义是指皇宫，这里当然是代指朝廷。戚继光用《望阙台》这个诗名，其实就是表达了他无论身在何处，始终心向神京的耿耿忠心。《望阙台》全诗是这样写的：“十载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其中最后一句还有一个版本，作“洒向千峰暮叶丹”。

“十载”，在这里是一个取整的数字，戚继光从浙江再转战福建，前后大约是十年的时间。“十载驱驰海色寒”，他在祖国的沿海一带抗击倭寇，这一路的艰难险阻真是一言难尽。“孤臣于此望宸銮”，“宸銮”的本

义是指皇帝的车驾，这里当然也还是代指京城，那也是国家的心脏所在。戚继光奔走边疆，孤悬海岸，但他始终心向朝廷、心向家国。正是这颗热烈的报国忠心，才能够让他克服无数的困难，取得抗倭的决定性胜利。“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我觉得“繁霜”这个词用得真是绝妙。它既是写实，因为正是秋天的繁霜催红了漫山遍野的红枫；但它也是比喻，用繁霜和心头奔流不息的报国热血相比拟，那千峰万壑的一片火红的枫叶，不正是戚继光一片热血丹心的最好反映吗？繁霜、红枫，热血、丹心，既是戚继光高超的诗歌技巧的表现，也是他一腔爱国热忱的真实流露。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一、总书记原声

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要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二、经典释义

这是总书记 2018 年 5 月 2 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次会上他引用了“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这两句名言。这两句话出自于《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并非晏婴自己的著作，而是后人采缀晏子的言行记录而成。晏婴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为齐国名相，被人尊称为“晏子”。“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正是出自这部著作当中记录的晏子的两句名言。晏子说这两句话的大概背景是这个样子的：齐景公打算要重赏谄谀之人，可是主管的大臣却并不想顺从齐景公的旨意，景公非常恼火。晏子知道了之后，就主动进宫去朝见景公，并且还说了一大段推心置腹的话来劝谏景公。他的大意是说，在夏商周三代，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之所以能够振兴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意思就是说，国家是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哪怕对于个人利益有所损害，也应该加以爱惜和保护；凡是不利于国家的事情，哪怕对个人利益有好处，那也应该厌恶摒弃它。国家利益永远先于个人利益。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个从小立志，长大成才的典范人物。明代的于谦。于谦小小年纪就胸怀大志，在他还未成年的时候，就写下过“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样的诗句，那不仅是他少年时候的理想，而且在他成人以后，还用行动去实现了它。

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的时候，也先大举进犯明朝，当时在位的明英宗听信了宦官王振的唆使，决定御驾亲征。结果可以预料，准备充分的也先军队大获全胜，明英宗被活捉。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混乱。幸好这个时候，还有于谦头脑清醒地出来主持大局。于谦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地调兵遣将，在重要的关口都设置了重兵把守，并且还采取了炮

攻的方法，把骄傲轻敌的也先部队打得落荒而逃。

在于谦的努力下，明朝廷保住了北京，平定了朝廷乱象。像于谦这样文武双全的爱国志士，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钢铁长城”。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第二季第五集)

